

调整压力。

此外，使用年度财政赤字也是可考虑的指标。据IMF测算，2010年全球总体的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将从6.8%降至6%，同期，G20国家总体的赤字水平将从7.5%降至6.8%。后者中，发达国家将从9.4%下降到8.9%，而新兴经济体将从4.8%下降到3.7%。全球财政赤字水平趋于改善。预期2011年发达和新兴经济体进行周期调整后的财政赤字水平会再降低1%。如果G20以恢复至金融危机前（2007年）的财政负债和赤字水平为目标的话，那么大多数国家需要进行较大力度的财政整顿（Fiscal Consolidations），否则主权债务危机就将是长期困扰全球经济的阴影。

以私人储蓄和负债衡量的内部不平衡性。这个指标的争议较多，中国承受的压力较大。所谓争议，指的是私人部门的储蓄和负债状况，以及测量方法的差异性很大。私人部门的储蓄和负债情况，和一国的文化教育、人口结构、社会安全网络以及收入分配有紧密联系。同时，如何测量私人储蓄和私人负债，使其可以进行国别比较也存在争议。例如，中国过高的储蓄率和美国过低的储蓄率是全球经济不平衡的一个突出现象。国际清算银行的研究显示，从私人、企业和政府三部门的总储蓄率（储蓄/GDP）的横向比较看，中国2008年为53%，而美国同期只有12%，在主要国家中处于最低。相关的研究则显示，对统计口径进行调整之后，中美私人储蓄率的平均差距将缩小8.6个百分点。和外部平衡相比，内部平衡往往和国民福利问题相纠缠，调整起来更为艰难。

量化约束：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可能影响

从长期看，发达经济体受到公共和私人债务居高不下、人口老龄化和社会福利负担的持续压力，新兴国家则受到经常账户盈余和资源约束并存、净储蓄较高和社会安全网薄弱的困扰，全球经济面临再平衡的压力。

全球经济再平衡是必要和紧迫的。由于各国生产率、金融市场效率、人口结构等方面的客观差

异，一定程度的经济不平衡是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效分配的体现。但是，一国经济过度不平衡则值得警惕和纠正。对于谁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责任方，目前基本没有一致共识。一些观点认为是美国消费过度、储蓄不足，另一些观点则认为一国消费不足、储蓄过度也会导致失衡。但是就单个经济体自身而言，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是明确的，即由影响投资和储蓄的跨期选择所致。由于经常项目余额分别由私人 and 政府的储蓄投资差额组成，所以，外部平衡的实现取决于私人 and 政府的储蓄投资平衡，而政府的储蓄投资余额即财政余额。

对于财政负债、赤字水平过高的经济体，提高储蓄、适当整顿财政是可取的，但实际困难重重。就债务问题而言，由于财政赤字部分是由于社会老龄化需求、卫生支出增加等非相机决策的结果，财政调整存在难度。就经常项目赤字问题而言，主要还是由于私人部门的储蓄投资不平衡导致，在增加私人部门储蓄或者改善出口方面，政府要么作用有限，要么过度使用量化宽松和汇率政策。

对于财政、经常项目盈余的经济体而言，非石油输出新兴经济体的盈余主要是私人部门的投资储蓄不平衡所致，财政余额的影响很小。在理论上，一方面可以采取扩张性的财政和紧缩的货币政策，通过增加支出，缩减经常项目盈余；另一方面可以升值本币，将需求导向国外产品，同样实现盈余的缩减。但前者容易加剧通胀风险，后者容易损害本国贸易部门的竞争力。

迄今为止，全球经济不平衡的现象是否合理，是否需要进行量化约束的调整是很有争议的。实际上，要制定出能保证既有合理参考价值又有一定约束性衡量指标及相应的指标参考值是十分困难的，但也不排除在部分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推动下，目前的这些参考性指南存在向逐步刚性化，甚至成为量化约束指标的方向发展的危险趋势。而参考性指南如果刚性、量化，可能也意味着G20将面临向机制化转型的压力。■

作者钟伟系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教授

作者王栋贵系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系博士生



>>>

2月11日，埃及民众在埃及首都开罗市中心的解放广场庆祝穆巴拉克下台。新华社



埃及政治变局的经济根源

文/王林聪 编辑/许涛

2011年的新年钟声余音尚未消逝，埃及港口城市亚历山大一座科普特人教堂附近就发生了一起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事件，21人在爆炸中丧生。这似乎预示着埃及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是何等的不同寻常。半个月之后，开罗一家小餐馆老板为抗议政府的面包补贴政策来到埃及人民议会大厦前自焚。此后，自焚仿效事件屡发，民情激愤，终于在1月25日演变成一场规模空前的民众示威。抗议活动迅速从大开罗蔓延到其他城市。仅仅18天之后，执政近三十年的穆巴拉克总统就被迫辞职，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埃及政治变局之所以出现，一个最为明显的原

因是社会矛盾尖锐，民生问题突出。凡是到过埃及的人都有一种相同的感受：这是一个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国度，快速的城市现代化建设伴随着管理上的混乱无序。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开罗，拥挤不堪的街道上很少有红绿灯交通管制，随处可见有人居住的“烂尾楼”，城市周围的“贫民窟”棚户区更是尽人皆知。大都市开罗就是埃及贫富悬殊和社会发展不平衡的一个缩影。

物价飞涨 民怨沸腾

早在1977年，一场规模巨大的“食品暴动”就曾震动埃及朝野。其直接原因是政府宣布提高基本

食品价格，导致民怨沸腾。民众纷纷举行示威游行，冲击豪华宾馆和达官显贵居所，最终迫使政府收回成命，抗议活动才渐渐平息。

三十多年之后，同样出现的物价飞涨再一次引发了民众抗议示威，所不同的是它最终颠覆了穆巴拉克的统治。人们还清楚地记得去年10月埃及物价扶摇直上的情景。当时，埃及市场上蔬菜价格节节攀升，达到了疯狂的地步。在基纳省，西红柿价格从正常情况下1千克2.5埃镑攀升至15埃镑，价格涨幅达到了600%。市场上黄瓜价格从2埃镑上涨到5埃镑，土豆、大蒜、扁豆的价格分别为4埃镑、9埃镑和10埃镑。基纳省的一位教师说，我们5口之家一餐所费竟高达90埃镑。时任总理纳吉夫表示，要尽一切能力控制物价上涨。但是他很快就认识到，物价上涨已经超出了政府控制能力。对此，有的媒体以“埃及的蔬菜危机：革命究竟是怎样开始的”来形容日益严峻的社会情势。

物价上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世界粮食危机。埃及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小麦进口大国，每年进口约600万吨小麦，以满足国内60%的需求。随着国际粮食危机的加剧，一些国家限制小麦谷物出口，世界粮食价格快速上涨。埃及进口小麦数量因此下降，国内食品（谷物及面包）价格上涨，推动蔬菜价格飞涨，大大超出了普通民众的承受能力，进一步加重了国内民众的困境。民众不满情绪蔓延，普通职员要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抗议活动时有发生。特别是内阁会议召开期间，民众在政府大楼前举行抗议活动。一些反对派组织诸如“够了运动”、人民自由阵线、青年正义党等，公开抨击主管金融、人力资源的政府官员，要求政府提高工资待遇，遏制物价上涨，解决民生问题。

“三高”凸显 民生困苦

在穆巴拉克当政的近三十年，埃及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转型速度加快，现代化的气息从城市到乡村随处可见。埃及政府连续执行了五个“五年规划”，2007年开始的第六个“五年规划”（2007~2012年）目前正在实施之中。2008年金融危机前，埃及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达到7.2%。即使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的2010年，埃及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也仍达5.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2700美元，步入了中低收入国家行列。旅游业收入、苏伊士运河过境收入、侨汇、石油收入等逐渐成

为经济发展的四大支柱。埃及政府还制定了21世纪经济发展长远规划，相继实施了南河谷、北西奈（和平渠）、东塞得港、西北苏伊士湾等国家重点工程，希望通过这些工程来扩大耕地、增加就业、解决人口过快增长难题。可以看出，在加快社会发展过程中，埃及政府努力寻求一个“合适”的平衡点，既能推动改革的进度，又能解决复杂的社会矛盾，减缓社会张力。然而，转型时期的埃及，各种矛盾交织，社会问题突出，特别是饱受“三高”——高通胀、高失业、高贫困问题的困扰。

“三高”问题凸显是世界金融危机波及和传导的结果。在世界金融危机的打击下，埃及国内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从2007年的9.5%陡然升高到2008年的18.3%，虽然2009年略有回落，但到2010年通胀率再次超过了10%。同样，高失业率也是埃及社会中最棘手的问题。官方公布的失业率大都在9%~10%之间，但实际情况却远远高于这一数据。去年10月，当物价飞涨之际，由于经济增长率下滑，国家创造的就业机会呈下降态势，从上个财年的11.68万降至8.77万，整个就业形势堪忧。与此相应的贫困率同样一直处于高位。按照埃及官方发布的数据，2000年的贫困率（以每天生活费不足1.25美元为贫困线标准）为16.7%，2005年上升至22.5%，2010年仍高达21.6%。如果按照国际上通行的以每天生活费不足2美元为标准，埃及贫困人口则占总人口的40%。在城市的棚户区，大批居民处于赤贫状态；在落后的上埃及地区，分布着1000多个贫瘠的村落，亟待政府的救助。鉴此，埃及学者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贫穷和穷人是我们的地雷。”埃及“三高”现象积累已久，且日益凸显，远远超出经济问题范畴，成为引发社会危机和社会动荡的主要因素。

社会“年轻化” 青年扮演“倒穆”先锋

人口结构的年轻化是阿拉伯国家的普遍现象。在许多阿拉伯国家，25岁以下人口超过一半，特别是15-30岁年龄组，占了人口的30%。因此，一些阿拉伯学者几年前就曾警告说，急剧膨胀的失业青年群体是一个嘀嗒嘀嗒的时钟炸弹，不知道哪一天就会被引爆。

就埃及来说，可谓人多地狭。在其100.2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沙漠地带就占了96%，只能以剩余的4%土地养活着不断膨胀的人口。而目前，埃及的人口已经超

过8000万，全都密集地分布在狭长的尼罗河两岸。社会的年轻化和人口布局的“头重身轻”是埃及人口结构的主要特点。例如，大开罗地区人口高达1844万（2007年官方估计），几乎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人口过于集中于大都市是过度城市化的结果，伴随而来的往往是失业、住房、污染、交通拥堵等一系列复杂而尖锐的社会问题。在埃及，15至29岁年龄占总人口的29%，也是失业者最为集中的一个群体。根据联合国2010年人类发展报告，在埃及失业大军中，90%的失业者是年龄在30岁以下的青年。受教育结构和课程设置不合理等影响，许多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其中有40%的男性和50%的女性找不到工作。

可以想象，在一个年轻化的社会，庞大的青年失业大军的存在无论是对于社会稳定，还是政权稳定都蕴含着巨大的风险，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伴随着突尼斯“茉莉花”运动的成功，这种传导效应极大地刺激了埃及青年群体，产生了“一切皆有可能”效仿突尼斯的强烈心理预期。他（她）们借助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手段，发泄对政府的不满，发动对政府的抗议示威活动。“要大饼、还要民主”，抗议活动从民生诉求迅速上升到政治诉求。在这一过程中，埃及青年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并主导着这场运动向着不妥协的“倒穆”方向发展。

经济问题困扰后穆巴拉克时代

如果说经济因素是埃及政治变局的决定性力量，那么，后穆巴拉克时代仍面临相同问题的考验。

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辞职后，由军方组成最高军事委员会掌控大权，负责落实向民选政权的过渡。埃及军方提出了明确的民主过渡时间表：“最高军事委员会”成立一个八人修宪委员会，在10天内提出修宪案，两个月内交付公投，六个月内还政于民。目前，已经完成了修宪，将于3月19日提交公投，由民众决定宪法修改能否通过。随后将举行人民议会选举，进而举行总统大选。在迈向民选政府的进程中，人们密切关注军方的动向，也关注国内最有影响力的组织——穆斯林兄弟会——随着它的合法化将扮演何种角色？更重要的是，新政府究竟如何解决民生问题？据埃及政府的统计，政治变局已经给埃及制造业、建筑业和旅游业造成了约17亿美元的损失。目前，新政府还拿不出一整套根治经济难题的方案，因此，工人的罢工、民众的抗议示威斗争时有发生。可以预料，后穆巴拉克时代的埃及将有一个艰难的过渡期，尖锐的社会矛盾，复杂的民生问题是任何一届政府都很难在短期内解决的。■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

对话：

Z=《中国外汇》 W=王林聪

Z：在埃及，随着穆斯林兄弟会的合法化，这股政治势力将扮演何种角色？

W：穆斯林兄弟会是一个有着八十多年历史的组织。长期以来，穆斯林兄弟会扎根基层，服务民间，在基层社会很有影响力，一直是埃及官方最有力的挑战者。目前，穆斯林兄弟会奉行温和、务实的政策，淡化宗教色彩，支持宪法修改案，谨慎处理与军方的关系。现在穆斯林兄弟会通过建党实现了合法化，这意味着在未来政治竞争格局中它的优势突出，在政坛上将会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Z：您认为，新政府该如何解决民生问题？

W：3月7日，新任政府总理沙拉夫完成组阁，新政府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多管齐下，包括：迅速恢复经济秩序，稳定信心；抑制物价上涨，提高职工工资；扩大就业，重点解决失业问题；加大反腐力度，加强金融监管等。在对外方面，争取国际援助，特别是欧盟和美国的经济援助，吸引国内外投资，恢复对国际游客的吸引力。埃及青年人还发起了名曰“安全埃及”的运动，欢迎外国游客重返埃及，以此来扩大收入，增加就业。

Z：埃及政治变局能给我们哪些启示？

W：每个发展中国家，都可以从埃及政治变局中总结经验教训。首先，切实解决民生问题是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在牵动民生的各种问题中，最敏感的是物价上涨和就业困难问题，必须认真对待。其次，要关心青年人的诉求，特别是大学生的就业与发展。关心青年就是关心国家的未来。第三，经济增长不能代替社会发展，社会公平是社会稳定的基础。